

● 古代文学

唐末三家古文学艺术论

——从皮、陆、罗“小品”的“光彩和锋芒”说起

熊礼汇

(武汉大学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熊礼汇(1944-), 男, 湖北公安人, 武汉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散文、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研究。

[摘要] 小品兴盛是唐末散文创作的突出现象, 但不是惟一现象。皮、陆、罗主要以古文创作见长, 不能将其古文都视为小品。三家古文各具艺术特色, 不能因为鲁迅说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都是抗争和愤激之谈”, 就把罗隐称为晚唐小品文作家中最具“光彩和锋芒”的“第一位”。

[关键词] 小品; 古文; 闲情别致

[中图分类号] I207.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5-0558-09

一

受鲁迅先生的影响, 一般文学史讲唐末散文, 多介绍当时的小品文, 作家则锁定为皮日休、陆龟蒙、罗隐三人。介绍其小品特点和成就, 也多从鲁迅说的“抗争和愤激”、“挣扎和战斗”, 来描述其“光彩和锋芒”。小品兴盛是晚唐(包括唐末)散文发展的突出现象, 但不是惟一现象。皮、陆、罗三家散文就不能全称为小品, 因而, 仅言小品是不能概括唐末散文发展特点的。

唐末散文发展至少有三个特点。一是作者们大都认同韩、柳等人的古文主张, 有意继承古文艺术传统。如皮日休不但肯定韩愈所标榜的道统、文统, 而且发挥其道统说, 认为韩愈确实继承了儒家的道统、文统, 表明自己也要承续其统绪。所谓“夫孟子、荀卿翼传孔道, 以至于文中子。……文中之道, 旷百祀而得室授者, 惟昌黎文公焉。文公之文, 蹴杨、墨于不毛之地, 蹂释、老于无人之境, 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 千百士之作, 释其卷, 观其词, 无不裨造化, 补时政, 系公之力也”^[1](第8349页)。一方面, 他把韩愈看做王通的后继者, 声称自己“嗜先生(指王通)道, 业先生文”^[1](第8388页)。另一方面, 他仰慕韩愈“身行圣人之道, 口吐圣人之言”或“身行其道, 口传其文”^[2](第8388页), 为文亦求明道, 自谓其文“皆上剥远非, 下补近失, 非空言也。较其道, 可在古人之后矣”^[1](第8352页)。至于陆龟蒙, 也是“有志扶荀、孟”、“为文通古圣”^[2](第7129页)。“自小读六经、孟轲、扬雄之书, 颇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规矩, 无出于此。”^[1](第8403页)就是罗隐, 虽十次应考十次不第, 他为学为人的态度, 也与韩愈对古文家的要求相合。他曾对人说:“仆之所学者, 不徒以竞科级于今之人, 盖将以昔贤之行止, 望作者之堂奥, 期以方寸广圣人之道, 可则垂于后代, 不可则庶几致身于无愧之地, 宁复虞时人之罪仆者欤? ……其进于秉笔立言, 扶植教化, 当使前无所避, 后无所避, 岂以吾道沉浮于流俗者乎?”^[1](第9333页)

二是强调古文“救时补政”的社会功用。皮日休《请孟子为学科书》,“请命有司去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理由就是读庄、列之文,不可能使人“汲汲以救时补政为志”。而他肯定贾谊《新书》,就因为它讲“抑诸侯而尊天子”、“灭胡越而崇中夏”,都是针对汉初重大政治问题而发。自道作文特点,亦谓“日休于文尚矣,……非有所讽,辄抑而不发”^[1](第8346页)。陆龟蒙曾批评江淹《青苔赋》,谓“尽苔之状则有之,劝之道则未闻也。如此则化下讽上之旨废”^[1](第8392页),也是主张为文当讽时劝世。皮、陆强调古文救时补政的社会功用,除时政腐恶、弊端丛生亟须疗救外,还与彼等尚儒学风重在实用有关。皮日休既谓“圣入之道,不过乎求用”^[1](第8349页),又说:“圣贤之文与道也,求知与用。苟不在于一时,而在于百世之后者乎?”^[1](第8375页)陆龟蒙好读经书,尤喜钻研《春秋》,推崇王通的《春秋》学,也服膺啖助、赵匡、陆质以意解经、联系社会实际以论道的学风。应该承认,皮、陆、罗等是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士,由于身处末世和个人境遇的限制,他们的“救时补政”之术实难为世所用,因而他们的古文多停留在对时政之弊的揭露和抨击上,虽然在揭露、抨击的背后,有理想的政治境界存在,但对如何达到这种境界即如何实施政治变革就极少触及。当然,这也是对儒道的“用”,但追求的主要是“在于百世之后”的“用”。

三是文章写作出现了篇幅短小、风格峭直、出语愤激、用词尖刻的倾向。这一倾向主要表现为杂文小品的大量出现。对唐末小品的认识,似应注意两点:一即唐末小品的艺术精神、艺术风格,和从一般意义上讲的(特别是明清人讲的)小品是不同的。准确地讲,它们应该称为古文小品,属于唐末古文中篇幅较小的一类;二即不能将皮、陆、罗文集散的散文都视为小品,也不宜用小品概指唐末散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51《笠泽丛书》就说:“惟杂文则龟蒙小品为多,不及日休《文薮》时标伟论,然闲情、别致,亦复自成一家。”看来,《提要》编纂者是不赞成将标举“伟论”之作划入“闲情、别致”的小品范围的。若依此论,皮日休那些篇幅甚短、“有骨力的文章”最好像鲁迅那样称为“短文”。他实在算不上唐末重要的小品文作家^①,就是陆、罗的短文,也只有一部分是小品。因此,对三家散文,还是称古文恰当。

二

皮日休(834—883?)的古文,主要见于《文薮》。《文薮》是他在中进士第的前一年即咸通丙戌(公元866年)自编的文集,编集的目的是为了行卷,希望能遇到元结因《文编》而深受有司赏识那样的机会。加上这些文章多作于隐居鹿门和漫游吴、越之时,故可称为处士之作或山林之文。皮子古文最重要的特点,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的“多能原本经术”。除《请孟子为学科书》、《请韩文公配享太学书》外,所作书、序、论、原、辨、碑各体之文,持论皆本于儒学。即使文中出现惊世骇俗之语,诸如《原谤》中说“后之王天下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摔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鹿门隐书》说“吾谓自巨君、孟德已后,行仁义礼智信者,皆夺而得者也”,最终的立论依据仍是儒学。像前一句,观念和文风都是学的《孟子》。

由于皮子古文可视为处士之文,便带来它的第二个特点,即多数文章偏于从理论(或理性)层面论析古今事理,用儒家政治理念、道德标准、价值取向衡量现实政治,规范自己和他人的现实人生。即使抨击时政、时俗之弊,总是超越众多具体现象,从中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本质特征,概括言之。

由于论事好概括言之,好从理性层面言之,故皮氏古文的第三个特点是用语精练,说得十分明白。因为用语精练,所以短文多;因为要讲得明白,所以少有掩饰或不加掩饰,直言尽言以至锋芒毕露。

作为应试前储备学养、加强写作训练(即“嗜道业文”。嗜道——求道之用;业文,为韩子之文)成果

的皮子古文,多数是借古文献、古代人物、古老命题以儒道尝试论之。如《春秋决疑十篇》、《补大戴礼祭法文》、《晋文公不合取阳樊论》、《易商君列传赞》、《汉斩丁公论》、《文中子碑》、《首阳山碑》、《诮庄生》、《旌王宇》、《斥胡建》、《鄙孝议上下篇》等。其中不少是用写读后感的方式写的,诸如《读韩诗外传》、《题叔孙通传》、《题安昌侯传》、《读司马法》等。另有一类文章,实是写作者对如何为人问题的思考,也属于求道之用,反映出他要田本于儒学的外世态度、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对规范士人行为的愿望。代表作有《六

箴》和《动箴》、《静箴》。《六箴》虽言作者“检身救己之志”，实是既讲君道、臣道，也讲士人的处世之道。像《祝疟疔文》，表面上看，是“讽刺‘上弄国权，下戏民命’的权臣”，或谓“是全面揭露晚唐官场种种丑恶”，其实，仍是在用儒家的人文精神规范官员的为臣之道，只是表现形式比较特殊，即借对疟疔的祷告，通过对臣子不规范行为的揭露、批判，来推行符合儒家规范的为臣之道。

在皮子古文中，《十原》和《鹿门隐书》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韩愈写过《五原》，皮子《十原》之作系学韩而为。立论的基本理论、依据是儒学及相关理念，但论述的问题比较具体，众多探本之说并未构成理论体系。其《十原系述》有云：“夫原者，何也？原其所自始也。穷大圣之始性，根古人之终义，其在《十原》乎？呜呼！谁能穷理尽性，通幽洞微，为吾补三坟之逸篇、修五典之堕策、重为圣人之一经哉！否则，吾于文，尚有歉然者乎？”可见，他十分看重《十原》弘扬儒学、订正讹误之说的意义。

读《十原》，知《原宝》、《原用》、《原谤》、《原刑》皆言为君之道，《原己》是既言君道，又言臣道，还可以认为是言士人君子之道。作者讲“敬于己者以道”，说到底，强调的是儒家“劳一心而安天下”、“劳一身而安万世”这样一种兼济天下的献身精神。《原化》尚儒，排佛一如韩愈《原道》，但不像《原道》从理论上清算佛、老罪行，树立儒学的权威，而是慨叹儒学、圣人之道在当今教化中主体地位的失落，和无人应世而出、挽狂澜于既倒。所谓“今知化者唯西域氏而已矣，有言圣人之化者，则比户以为嗤”。“苟轩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则吾以为孟子矣。”“呜呼！今之士，率邪以御众，握乱以治天下，……不曰难哉！不曰难哉。”《原化》居《十原》之首，颇堪玩味。事实上，《原化》所讲的儒学、圣人之道在教化中的地位为佛教所取代，正是唐末政治文化思想背景的突出特征。风俗移易，在皮子看来，唐末官场、士林、民间种种风衰俗弊之事，皆因此而生。这样，才激发了他弘扬儒学的主动性，才引出了他运用儒道“上剥远非，下补近失”的古文。

持论本于儒学，始终维护圣人的伟大，慨叹儒道的不行于时，是《十原》思想内容的基本特点。像《原奔》说：“奔之始作，必起自战国有害诈争伪之道，当从横者流之作矣。岂曰尧哉！岂曰尧哉！”^②《原兵》“以为蚩尤乃黄帝之诸侯，盖其为人暴，黄帝征而灭之”。《原祭》说“师祭”不当祭蚩尤，而“轩辕，五帝之首，能以武定乱，以德被后。今之师祭宜以轩辕为主，炎帝配之，于义为允”。都是通过推究事物的本原，辨析成说，以赞颂圣人之道。思维方式则是“穷大圣之始性，根古人之终义”，而将今人今事作为比照之物。论其辨析之精，真能做到“穷理尽性，通幽洞微”。论其文笔简洁，则表现为说理直进直出，决不拖泥带水；语少意明，针针见血；虽慨叹有声，总融入立论之中。故《十原》之作，篇幅短小（《原化》最长，不到400字；《原祭》最短，仅有百余字），却意深词新，不少句子直可作为警句看待。

《鹿门隐书》60篇，写的是作者习道观古以鉴今的心得，大概是学有所思，思有所得，即笔录之，故行文单刀直入，多古今对比；出语简明、深刻；多讲结论，少有论述。除五、六则可视为完篇，另有几则类似文章片断外，余皆为警句集锦，有的两句即为一则。由于是隐（藏而不露）书，又是记自家心得，故言事论理不掩情性，不但说得脱皮露骨，还出语犀利，辛辣味浓。作者在《〈隐书〉序》中说：“醉士隐于鹿门，不醉则游，不游则息。息于道，思其所未至；息于文，惭其所未周，故复草《隐书》焉。”文以明道，道、文本为一体。看来，作者作《隐书》是为了弥补他所读明道之文的不足，自命不可谓不高。就古文写作而言，他作《隐书》，似有积聚材料（主要是文章的理、意和语言材料），为构思预作准备的性质。像《隐书》所录下列句子：

洁者不观其穷，观其富也；慎者不观其危，观其势也。苟当穷能洁，当危能慎，戒也，非真也。（其十一）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其十二）

舟之有舵，犹人之有道也。舵不安也，舟之行，匪舵不进，是不安而安也。人之行也，犹舟之有舵，匪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其十六）

小善乱德，小才耗道。（其二十四）

士之隐也，志在其中，今之隐也，爵在其中。（其二十六）

人之肆其志者,其如后患何!(其二十八)

不以尧、舜之心为君者,具君也。不以伊尹、周公之心为臣者,具臣也。(其三十一)

古之决狱,得民情也哀;今之决狱,得民情也喜。哀之者,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赏之必至。(其三十八)

惮势而交人,势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道退。(其四十四)

爱虽至而不媿,仇已危而不挤,势方盛而知足,利正中而识已,岂小人之能哉!(其五十二)

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其五十六)

古之用贤也,为国;今之用贤也,为家。(其五十七)

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其五十九)

引文所言涉及问题颇多,一些说法和类似的语句就曾为皮子成篇古文如《原谤》、《读司马法》、《祝疟病文》、《六箴》等所采用。

三

陆龟蒙(?—881)举进士不第,从湖州刺史张抟游,作过湖、苏二郡从事,后隐居秋江甫里。陆龟蒙和皮日休相知相交,同为晚唐诗文兼擅而古文创作尤有特色的作家,有“皮陆”之称。

陆龟蒙的古文,清代四库馆臣称为“杂文小品”,并谓其“不及日休《文薮》时标伟论,然闲情、别致,亦复自成一家”。现存陆氏古文均为完篇,篇幅并不比皮子成篇的古文短小。四库馆臣称其为小品,大概有三个理由(从此也可见出他们的小品文体观念),一是篇幅较小,二是不作“伟论”,三是自有“闲情、别致”、“自成一家”。文章篇幅大小,本是相对而言,很难说死。拿陆文和宋明小品相比,就显得篇幅较大;拿它与唐宋鸿文相比,自然显得篇幅较小。所谓不作“伟论”,是指不议论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或未就此类问题发表重要看法),不以探讨重要的学术问题为中心内容(或未专就某一学理、某一人物、某一事件发表颇具理论色彩的见解)。陆文确实没有坐而论道的大作,就像众多学者说的,陆文的重要内容“是对唐末现实的真实揭露”(郭预衡语),除了用冷嘲热讽、嘻笑怒骂表示作者忿忿不平的心绪外,主要是用聚焦手段将现实社会中的腐恶现象凸显出来,并不作理论阐述。至于“闲情、别致”、“自成一家”,看似就内容言,郭预衡先生就说:“龟蒙的杂文杂感,确能自成一家,但大抵都是愤排之辞,不是‘闲情、别致’。”^[3](第337页)显然,郭先生认为四库馆臣讲的“闲情、别致”,指的是文章内容,并将其与“闲情逸致”(悠闲、舒适的情趣)等同。

其实,“别致”不同于“逸致”,“闲情、别致”是指陆文立意和表现形式的新奇而言。“闲情”,指的是陆龟蒙作为“江湖散人”、“布衣之士”的写作心态。他不是朝重臣,没有机会火急上表汲汲乎用。纵然有话要说,但“敢谏鼓不陈,进善旌不理,布衣之说无由自通乎天子。丞相府不开,平津阁不立,布衣之说无由自通乎宰执”^[1](第8393页)。只好以闲淡之心静心构思“别致”之文,以揭时政之弊。“别致”即新奇,指文章立意以及构思和表现形式的新奇。皮子之文有就事论理或借题发挥者,论立意、构思和表现形式之新奇,仅有一篇《祝疟病文》。余皆径言其理,虽然立意深刻,表达方式多是直来直去。大概皮子为文用力最多的,是对说理警句的锻造(力求其深刻、犀利、耸人听闻),不太讲究构思的奇特和表现形式的新异。陆龟蒙为文尚奇,自谓“我书奇奇,浑元未衰”^[1](第8409页)。陆文“奇奇”,自指意奇、语奇和构思方式、表现形式的新奇。既然如此,四库馆臣说陆氏杂文小品,在以闲淡之心作新奇之文方面,“确能自成一家”,就符合实际。

就一篇文章而言,陆氏立意新奇、构思新奇和表现形式的新奇,是完美地统一在作品之中的。比如《登高文》,意在抨击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臣不肖和揭露社会动乱、百姓遭殃的现实,表达作者的愤世、厌世之心。但并不是开门见山,径遂直陈,而是用九月九日“稚子”问“予”是否有意登高,“予”说不愿登高理由的方式引发出来。说理由也不是直斥腐败现象,却先对稚子于知来一番感叹,垂势说出自己为人

“时孤笑以独愤,乐正直而非险艰。为书摭之,与善治顽。有行同而迹类者,尚愤疾乎声颜”的特点,和不愿登高“肆远目而务周旋”的原因。如此行文,既能表白自己的正直、清高、嫉恶如仇,也对下写登高“周旋”对象的可恶有提掇作用。故接下来四节文字,分别细写三种人的恶行和老百姓的痛苦之状,均以“如此者又欲见耶”作结以寄愤。最后再来一段和首段照应,申说稚子所言登高“灾眚可道,郁陶可披”是不可能的。因为“惨戚在下,吾宁忍欺”(意谓面对高台之下老百姓愁惨悲戚的境遇,我哪能自己欺骗自己、视而不见呢)。“我中时病,言开怒随;我感物恻,遐瞻还噫。是使灾眚弥炽,郁陶愈悲。”如此认真诉说不愿登高的理由,对社会腐恶现象的抨击和揭露就显得十分自然。

又如《野庙碑》,意在抨击当今官吏鱼肉百姓、作威作福,而“一旦有天下之忧”,则“乞为囚虏之不暇”。大概作者平日对民间好事鬼、多淫祀就很有感慨,以为野庙“无名之土木”无功无德,不应受人奉祀。转而一想,现实社会中的官吏无功、无德于民,却要受人供奉,岂不远甚于野庙之神。于是便有了古文《野庙碑》行文的思路,有了因神及吏、借题发挥、大放厥词的表现方式。具体写作,则先说陋越间淫祀情形,有意突出“氓”对“神”的敬畏心理和奉祀之恭谨、虔诚,再对此加以评议。评议既“以古言之”,又“以今言之”,自以后者为重点。后者揭露、抨击官吏恶行劣迹,接得自然,骂得痛快。接得自然,盖因由神及吏转折无痕,语云“今之雄毅而硕者有之,温愿而少者有之”,说的是官吏,却巧用比喻,由说神过渡到说吏,承中有转,文气顺畅。骂得痛快,一是因为作者“言开怒随”,斥责有声;二是因为他用叙议结合的手法、尖刻的批判性语言、憎恶倾向鲜明的长句、反问句,把官吏作威作福、为人酷虐、百姓有难不关于心、国家有难辄投敌求生的行径揭露无遗。揭出歹行本身就有强烈的批判力量,更何况语带讥刺、连珠迸发呢!试读:“今之雄毅而硕者有之,……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载车马、拥徒隶者皆是也。”“民之当奉者一日懈怠,则发悍吏、肆淫刑,殴之以就事。较神之祸福,孰为轻重哉?”“一旦有天下之忧,当报国之日,则恇挠脆怯、颠蹶窜踣,乞为囚虏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语之土木耳,又何贵其真土木耶?直觉句句火气灼人。的确,“以今言之”正是本文的喷火口,本文“别致”,妙就妙在这个“喷火口”选得好!

陆氏作愤世、骂世之文,无论出语挟枪带棒,还是旁敲侧击、影射其人其事,都与皮子说理论事开门见山、径遂直言不同,总爱借说它事引出,或编一寓言、故事巧发愤激之词,立意、构思都给人新奇之感。像《送小鸡山樵人序》,实借写樵夫回应“吾”之责备的答词,真实记录黄巢起义之后,赋役沉重,农民不堪负荷的惨状。像《记稻鼠》,实借记乾符己亥岁吴兴稻农蒙受鼠灾事,抨击官家对灾民“赋索愈急,棘械束榜捶木肌体者无壮老”。作者构思得巧,由今日食稻之田鼠思及古代“重敛”之“硕鼠”。在议论中浩叹一声:“率一民而当二鼠,不流浪转徙聚而为盗何哉!”其联想因事而发,浩叹又因联想而生,一切顺理成章。又像《蠹化》,意在抨击“灭德忘公,崇浮饰傲,荣其外而枯其内,害其本而窒其源”的官僚,警告他们将要面临“为大螯网而胶之”的下场。但文章却从“桔之蠹”写起,再巧妙引伸,谓“天下,大桔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略,大蕙篁也”云云,直落到官僚身上,然后对其歹行好一顿数落。再如《马当山铭》,实是痛骂小人心地阴险,是借为马当山作铭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先概言太行、吕梁之险,细写马当之险,再说太行、吕梁、马当虽险,尚可一一征服,而“全是三险而为一,未敌小人方寸之包藏”。由议论山水之险而说到小人心地之险,也是借题发挥。好处是在铺陈山水之险之后,再说小人心地之险非“三险合一”所能敌,能给人一种穷冈峦而乍见奇峰的新异感、震撼感。

其实,好假事以言理是陆氏为文的一种艺术习惯。其愤世、骂世之文如此,表达其政治愿望和人生态度的文章也是这样。如《治家子言》,是借写“治家子”讲他祖孙三代由作田器而工器而兵器的变化,使周武王闻之而惧,“遂包干戈,劝农事”,以表达作者的愿望。《奔蜂对》,是借师旷应对晋悼公“奔蜂”之问,所谓“今君先有晋国,宜乎上保宗庙之基,下近百代之资,择而可化而化,无俾奔蜂逞术于君王”,表达作者对当时君王的希望。《招野龙对》借野龙和豢龙的对话,表达作者鄙薄爵禄、热爱自由,耻于被统治者所豢养的人生态度。《蟹志》更是借对蟹生活习性(“稻之登也,率执一穗以朝其魁,然后从其所之”,由稻田入江,再入海)的议论,说治学的大道理。“今之学者,始得百家小说,而不知孟轲、荀、杨氏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于圣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说,汨汨也;孟轲、荀、杨氏,圣人之流也,六籍

者,圣人之海也。苟不能舍沮洳而求渌,由渌而至于海,是人之智反出水虫下。”

要深入认识陆氏古文小品特点,其《祭梁鸿文》、《哀茹笔工文》不可不读。前者有谓“先生为《五噫之歌》,汉天子闻而病之”。“适乎道而无颇,比要离(春秋吴国侠士)之列魄。”“所以法先生之义者,庶《五噫》之可作。”可见他的人格精神和诗、文创作倾向,是其来有自的。具体说,他为人服膺儒道(准确地说应是大中之道)坚定不移,为诗为文敢于讥刺、抨击时政之弊,曾受到乡贤梁鸿的激励和引导(至少使他有古有知音的感觉)^③。其古文小品(诗作亦然)用讥刺语言揭露、抨击社会腐恶现象的方式及其所体现的批判精神,即出自他对《五噫之歌》艺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后者有谓“我书奇奇,浑元未衰”,这是陆氏自道文章特点。“浑元未衰”是说文章内含天地元气,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我书奇奇”自是说文风之奇。其语虽出自韩愈说的“不专一能,怪怪奇奇”^④(第570页),但陆氏所言却是实话。文风之奇,是陆氏的自觉追求。其《怪松图赞序》,即谓“文病而后奇,不奇不能骇于俗”,他是从奇文能产生强大社会功用(或社会效应)的角度,追求文风之奇的。其《甫里先生传》,又谓其“少攻歌诗,欲与造物者争柄,遇事辄变化,不一其体裁。始则凌轹波涛,穿穴险固,囚锁怪异,破碎阵敌,卒造平淡而后已”。也讲到通过奇特的题材、奇特的构思、奇特的形象、奇特的语言,来创造平淡、自然的诗歌境界。由于尚奇,所以他对孟郊、李贺写诗追求意奇、语奇、境奇的苦吟功夫评价不低^⑤(第8418页)。有意思的是,陆龟蒙求奇,其借事以言理、借论事以吐愤,与李贺借事以抒怀也有相同处,即都有探寻前事或借助神话、传说资料创作故事来构思作品的习好。当然,作为古文家,陆氏继承的主要是孟子、扬雄、元结、韩愈的文风。他学孟子,主要是学《孟子》的尖锐、泼辣;学扬、元,主要学其不合流俗的精神,并不推崇其语词的僻深、想象的诡诞。学韩,则着重于其“怪于文”的一面。论奇,不少文章都能得韩文之仿佛。如《管城侯传》之于韩文《毛颖传》,《告白蛇文》之于韩文《鳄鱼文》,《野庙碑》说官吏歹行文字之于韩文《送李愿归盘谷序》说“大丈夫”为人文字,皆是。当然,陆氏之文“奇奇”,也不单是学韩所致,如其《招野龙对》、《后虱赋并序》、《蚕赋并序》等,分明就受到柳宗元寓言和骚体小赋的影响。

四

罗隐(833—909),本名横,字昭谏,十上不第,遂更名。罗隐“诗文凡以讥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⑥(卷九)。其诗文以讥刺为主,前人或以为是他“既不得志”,有一肚皮的牢骚要倾泄。所谓“所为《谗书》,乃愤闷不平之言,不遇于当世而无所以泄其怒之所作”^⑦(第448页)。“观《谗书》及所赋诗,大抵忿势嫉邪,舒泄胸中不平之蕴焉耳。”^⑧(第448页)罗隐诗风、文风如此,自与其人生境遇有关,同时也受到他为人简傲、性格谐谑、好高谈阔论、出言不逊的影响。罗隐并不认为其诗其文只是发一己之牢骚,而是将诗文写作纳入他“广圣人之道”、“秉笔立言,扶植教化”的活动中。他在《《谗书》重序》中就说:“盖君子有其位,则执大柄以定是非;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

《谗书》是作者自编的散文集,成于咸通八年(867)。当时他已来京七年,屡试不第。大概编集前所收文章已为时人所知,故其《《谗书》序》言书名来历,即谓“他人用是以为荣,而予用是以为辱;他人用是以富贵,而予用是以困穷。苟如是,予之书乃自谗书耳,目曰《谗书》”。这当然是发牢骚,和他作《谗书》志在“疏善恶”,“警当世而诫将来”,并不矛盾。

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说过:“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都是抗争和愤激之谈。”据此,有学者认为罗隐确实是晚唐小品文作家中的“第一位”。还有学者具体指出:“愤激不平,本是唐末杂文小品的共同特点,但罗隐同皮、陆诸人相比,尤为激烈。……隐之身世更寒贱,对于世事更不平,见事更分明,吐辞也更尖锐。行文短小而精悍,其锋芒所向,有非《文薮》、《笠泽丛书》可及者。”^⑨(第338页)其实,皮子《文薮》所收古文并非小品,一定要将三家当做小品文作家,论艺术造诣,也是各有所致,很难分出高下。若论文中“抗争和愤激之谈”,“吐辞”之“尖锐”、“激烈”,皮、陆并不亚于罗隐。实际情况是:皮子是将他尖锐、尖刻的愤世、骂世之言,用议论方式或格言、语录方式直截了当地陈述出来,陆氏是将他尖锐、尖刻的

愤世、骂世之言,用述说寓言、故事的方式引发出来,借事作论或借论事抒怀,不但把时政之弊说得脱皮露骨,而且用语挟枪带棒,不掩锋芒。

总之,皮、陆揭露、抨击现实弊端,既带愤激情绪,又用诤直、犀利之语。而罗隐《谗书》“所次论说杂出,间以韵语。大率愤懑不平,议古刺今,多出新意,颇以崭削自喜”^[7](卷八)。其文虽刺时讥世,除《刻严陵钓台》,借议严陵、刘秀“故人之道”明白指斥今日风俗偷薄(所谓“今之世,风俗偷薄,禄位相尚,朝为一族人,暮为九品官,而亲戚骨肉已有差等矣,况故人乎!呜呼!往者不可见,来者未可期,已而!已而!”),其余“议古刺今”或“体物讽刺”,多就“古”就“物”作“愤激之谈”,虽然意在批判现实,都是指桑骂槐、影射今人今事。故《谗书》愤激、尖锐主要表现在“议古”、“体物”之中,当然从此也可看出他对时政之弊的极端不满,若就明言直斥时政之非而言,所吐之辞,并不比皮、陆“激烈”、“尖锐”。另外,对“世事”的“不平”、“见事”的“分明”,皮、陆也未必不如罗隐。但说罗隐和皮、陆诸人相比,“身世更寒贱”,“行文短小而精悍”,却是事实。

罗隐《谗书》抨击时政,吐辞“激烈”、“尖锐”,不但不如皮、陆骂世之文,就连自家所作愤世之诗也赶不上。其诗感时伤事,激楚悲凉,即使说得幽默,也语语带刺。如《帝幸蜀》云:“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金钱花》云:“占得佳名绕树芳,依依相伴向秋光。若教此物堪收贮,应被豪门尽斲将。”《感弄猴人赐朱绂》云:“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买取胡孙弄,一笑君王便著绯。”皆直接针对现实中事,冷嘲热讽,作不平之鸣。罗隐作《谗书》,既然不是为了一泄愤世之慨,而是志在“疏善恶”、“警当世而诫将来”,故书中短文,绝大多数都是对古人古事的评议(这一特点与包括罗隐在内的晚唐诗人好作吟史诗的风气相通)。当然,作者评议古代何人何事,自有其现实针对性。但在表述上,却使人感到“刺今”力弱,“警世”味长。

《谗书》评议古人古事以警当世,大抵有三种表述方式。一是明言古人古事之非以警当世。如《英雄之言》,以刘、项为例,说明古代“视国家而取者,则曰救彼涂炭”的虚伪,似有警告当今皇上“防乎盗也”之意。点题的话是“为英雄者犹若是,况常人乎”。《汉武山呼》,实论为君之道,言“前后左右之谀佞者”、“穷游极观者”及“发于感悟者”为“国之大蠹”。文谓武帝“劳师弊俗以至于百姓困穷”,乃“东山万岁之声”所致,断言“东封之呼”实“为英主之不幸”。就唐末君主而言,这似乎不是他们所应吸取的最重要的历史教训。《救夏商二帝》,从一全新角度论述夏桀、商纣的历史作用,谓“千载之后,百王有闻其名者,必缩项掩耳,闻尧、舜者必气跃心跳”。点题的话是“慕之者未必能及,惧之者庶几至焉”。这可以说是对包括当今皇上在内的“惧之者”的讽刺,也可以说是对当今皇上的提醒。《伊尹有言》,实说为臣之道,立论角度亦新。中谓“伊尹放太甲、立太甲,则臣下有权始于是矣”,又谓“伊尹不耻其身不及和仲、稷卨,而耻君不及尧、舜,在致君之诚则极矣,而励己之事何如耳”。作者对伊尹放、立太甲、苛求君主持非议态度,似因晚唐宦官废立君主、掌控其生死命运而发,但文中并未点明。《题神羊图》,说“尧之庭有神羊,触不正者”,后人画其像不应“使头角怪异”。理由是尧之羊犹今之羊,只是尧时“淳朴未去,故虽人与兽,皆得相指令,及淳朴销坏,则羊有贪很性,人有刳割心”。“贪很摇其正性,刀匕刳其初心,故不能触阿谀矣。”这是讲后世谏官不能谏的原因,既归咎于世风不淳,还归咎于谏官“贪很”和“不正者”“有刳割心”。这也可以说是对现实政治的抨击,但这种抨击是通过话中之话表达出来的。《越妇言》构思巧,作者就《汉书·朱买臣传》“居一月,妻自经死”展开想象,编出一段骂词,将朱买臣“通达”前后言行不一揭露无遗。所谓“饥寒勤苦时节”,“何尝不言通达后以匡国致君为己任,以安民济物为心期”;“翁子果通达矣”,“而向所言者,蔑然无闻”,“岂急于富贵,未暇度者耶?以吾观之,矜于一妇人,则可矣,其他未之见也”。作者这样写,显然不是专为朱买臣妻作翻案文章,而是借越妇之言剥下古今大小“朱买臣”的画皮,以发其愤。

二是在评议古人古事时说出某种道理以“警当世而诫将来”。所说道理往往是大道理,很难说就是指斥现实中某人某事,或用以指导某种现实活动。如《三帝所长》说“是以土阶之际万民亲,宫室之后万民畏”,《风雨对》说“是以大道不旁出,惧其弄也;大政不问下,惧其偷也”,《丹商非不肖》说“是陶虞之心,示后代以公比”,《秦之鹿》说“去道与德也,兽焉不独秦”,似乎都在进为君之道,有规劝当今皇上行为之

意,但又何尝不是总结历史经验、泛泛作论呢?要与现实挂钩,至多意在启导君主而已。至于《辩害》说“虎豹之为害也,则焚山不顾野人之菽粟;蛟蜃之为害也,则绝流不顾渔人之钓网。所全者大,所去者小也。……是以佐盟津之师,焚山、绝流者也;扣马而谏,计菽粟而顾钓网者也”,似讲为臣之道,意在鼓励臣下为国除害以改变“君臣上下之不正”的局面。由于尽用古人古事作论,并不确指今事,读者思索其理便各有体会。郭预衡先生就认为:“在罗隐看来,当时‘君臣上下之不正’,徒‘抱空器’,已不济于用了。……这样的文章已是易代之际的呼声。”^[3](第340页)如《梅先生碑》讲“宠禄所以劝功,而位大者不语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则正人在上,天下无道则正人在下”,《杂说》讲“是以有用者丝粟之过得以为迹,无用者具体之恶不以为非”,《道不在人》讲“穷不可以去道,文王拘也,王于周;道不可以无时,仲尼毁也,垂其教”,《槎客喻》讲“苟人能安其所处而不自乱,吾未见其有颠越之心也”,《善恶须人》讲“善不能自善,人善之然后为善;恶不能自恶,人恶之然后为恶”,多出自作者现实生活感受,有的实为其人生慨叹。体会语气,讥世之意或有一二,说全是“抗争”之词、“愤激之谈”,似乎不当。

三是寓意于故事或对事物的议论中,字面上全不涉及现实问题。这又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叙说史实或议论事物,用语虽未涉及今人今事,却极易使人从中悟出今人、今事当如何的道理。比如《龙之灵》,既说“龙之职,水也。不取于下,则无以健其用;不神于上,则无以灵其职”,又谓“苟或涸一川然后润下,涸一泽然后济物,不惟濡及首尾,利未及施,而鱼鳖已敝矣,故龙之取也寡”。所说并未涉及时政,但读者却能由龙的特有文化意蕴想到作者的用意。他认为君王或朝廷应该向百姓收取一定的赋税,但所取要少,不能竭泽而渔。而且,朝廷收取一定的赋税,是为了“润下”、“济物”。《吴宫遗事》全不作论,只在叙说夫差赐伍员死而用伯嚭的情节后,用交代故事结局的方式冷静说出“明年,越入吴”五字。文章立意何在?这五个字已作了提示。第二种情况是通过叙说故事或议论其事显示思想倾向,由于指意性的议论过于概括,作者警世之意实难确指。比如《市儻》,是就“市儻”之时,“都会恶少年”装扮成鸟兽模样“丐乞于市肆间,乃有以金币应之者”一事作论。其论有谓:“复安有人者则不得人之金币,为鸟兽者则可以得人之金币乎?岂以鸟兽无知而假之则不愧也,以人则识廉耻而取之则愧焉?”从字面上看,作者认为恶少假冒鸟兽以牟利,是一种不顾廉耻的行为,但说“岂以鸟兽无知”云云,实际上还是承认他有“廉耻”之心。而“复安有人者”云云,分明是就何以假冒鸟兽能牟利的原因质疑,作者只是说了假冒者“假鸟兽以为名”的心态(巧妙的批判),而未言及假冒者屡屡得手的社会根源。故此文立意所在,当是痛斥社会上那些不顾廉耻、惯于用假冒手段牟利的人物。有人说此文“实际上是骂贪官污吏巧立名目搜刮百姓,中饱私囊,比恶少更无廉耻”^[8](第213页),是否符合文意,难说。《齐叟事》通篇只记一故事。说齐叟让子弟轮流掌管田庄,却不信任他们,于是便叫“犹吾之家隶”的“邻姬”来监督长子。谁知“邻姬”却鼓动农户殴打、驱逐齐叟长子、次子,到了齐叟将用老三替代老二时,旁人才告诉齐叟:不是农户不好,问题出在姬督制上。齐叟醒悟,逐姬而复二子之职,当年秋收太平无事。故事结尾说:“则前之谋悖者果姬也,而农户何能?”末二句应是点题的话,但仍是在说故事。由于形象大于思想,读者对作者记这一故事的用意就会有不同理解。可以说他在讲为父之道,也可以说他在影射晚唐君主借宦官钳制朝臣之事。另有《说天鸡》、《荆巫》也以说故事为主,虽篇末致慨有点题之意,究竟讥斥当日何事,实难坐实。如对前者,有人说“这是对那些尸位素餐的腐朽官吏的影射”^[9](第345页),还有人说“这是针对唐末以貌取人的吏治而发”^[8](第211页)。此外,如果说作者是在慨叹今日养才之道的败坏,似乎也不无道理。对后者,读者多以为作者讲荆丞“牵于心,不暇及人”,是“讽刺统治者因私害公”^[9](第345页)。不能说不对,恐怕还可以作别的理解。因为作者为之感慨的是:“以一巫之用心尚尔,况异于是者乎?”大千世界“异于是者”的,当然不只是为官者。

从《谗书》三种表述方式可以看出,罗隐的文章风格与他为文“警当世而诫将来”的目的是一致的。即使骂世刺今,也是概言、隐言,并不采用短兵相接的战法。这样,文风的尖锐、泼辣就远不如皮、陆。若论艺术构思、文学意味,罗隐之作却不在皮、陆文章之下。

要说明的是,除《谗书》外,罗隐还写有不少人物传记,其记人叙事最有特点的是《记石烈士》和《拾田

子年事》。另有《上招讨宋将军书》，是他作布衣时写的。文中数落节度使宋某罪过，出言激烈，至云：“自将军受命，迄今三月，关东之惨毒不解，杀伤驱犍之不已，乃将军为之，非君长、仙芝所为也。……今将军勋业不若卫公靖之多也，出师非郑薛之敌也，而横拥仕伍，鞭挞馈运，以愚度之，将军之行，酷于君长、仙芝之行也。”真是单刀直入，词正义严，和《谗书》文风大异。

注 释：

- ① 汤高才等主编的《历代小品大观》(上海三联书店, 1995 年), 就连皮氏一篇短文也未选。
- ② 孙继《无用闲谈》谓《博物志》载弈棋为尧所制, 以教丹朱。皮日休极口谓不然, 乃谓起于战国纵横之士。孔子谓‘不有博弈者乎’, 是春秋时已有之矣, 日休偶不察也。”
- ③ 梁鸿本为东汉初年扶风人, 晚年在吴居于臯氏廊下小屋, 为人佣工舂米, 其墓在吴西门外, 可称为吴地先贤。

[参 考 文 献]

- [1] 董 诰, 等. 全唐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2] 彭定求, 等. 全唐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3] 郭预衡. 中国散文史: 中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 [4] 马其昶. 韩昌黎文集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5] 傅璇琮. 唐才子传校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6] 郭预衡. 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 隋唐五代卷[Z].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7] 李慈铭. 越缦堂读书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8] 廖士杰, 樊修章. 晚唐小品文选注[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 [9] 孙昌武. 唐代古文运动通论[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4.
- [10] 纪 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9.

(责任编辑 何坤翁)

Review on the Art of the Ancient Prose by the Three Writers by the End of Tang Dynasty

XIONG Li-hu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XIONG Li-hui (1944-), male,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ancient prose and literature.

Abstract: The prosperity of essays was a distinguished phenomenon in the field of ancient prose writing in the end of the Tang Dynasty, but not the unique phenomenon. PI, LU and LUO were mainly well versed in writing ancient prose, but we shouldn't look on all of their proses as essays. The ancient proses by the three writers had their own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We shouldn't regard LUO Yin as "the first one" with "brilliance and spearhead" among the essay writers in the end of the Tang Dynasty in spite of LU Xun's statement that "the *Book of False Accusation* by LUO Yin almost all consisted of resistant and indignant words".

Key words: essay; ancient prose; leisurely and carefree mood